

白雲論壇

第四卷

张本义 主编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白云论坛

第四卷

张本义 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云论坛. 第四卷 / 张本义主编.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13-3584-8

I. 白… II. 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G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2909号

书名 白云论坛 (第四卷)

编者 张本义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9.75

版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13-3584-8/G·727

定价 55.50元

主 编 张本义

副主编 苏盛清 辛 欣

编 委 王子平 王 莉 邱 菊

孙 甜 孙海鹏

目 录

上 辑

仓修良	家谱杂谈	3
彭 林	守望中华礼仪之邦	31
施 丁	楚汉相争的决战问题	49
卞孝萱	漫谈中唐诗坛	65
刘一闻	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	96
刘作胜	汉字书法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117
王贵忱	东北名人书翰一瞥	134
张本义	摘藻扬芬连海情	140
上山大峻	日本人的心与佛教	155

下 辑

王充闾	古调洵堪爱 今人妙手弹	175
萧文立	写新都会 壮新胸怀 拓新气象 开新赋体	179
姜寿田	赋彩扬厉 书文俱美	195
张本义	大连赋	197
陈艳军	大连图书馆藏稿本述略	204
薛 莲	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之满文图书概述	217
范旭仑	大连图书馆藏古籍眉批选抄	236
王雨霖	大连图书馆藏国家善本概述	241
萧文立	初日楼词述论稿	250
辛 欣	浅析近代以前地域带给中日间的文化差异	361
刘 斌	中国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	371
魏 刚	毛文龙与“毛家将”述论	396
刘俊勇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411
孙海鹏	国贼郑孝胥旅大行事心迹考实	454
余彦焱	《读书敏求记》版本源流述略	500
吴 格	东洋文库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料随录	518
柳向春	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往来函件略考	567
董 桥	门前两株白果树	581
周笃文	《天风阁词》论稿	584
彭励志	尺牍书法中所见平阙书仪及艺术范式	594

上 辑



家谱杂谈

仓修良

一、家谱是什么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一种著作，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因此，即使是同姓未必就是同宗共祖，当然就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就如同样是王姓，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为琅琊王、太原王、晋陵王等许多宗支。因此，民间流传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并不确当。而在当时门第制度森严的社会里，则以琅琊王、太原王为高贵，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郡望来区别其他郡的王姓，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因此在当时，门第的高下，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记录的重视，则被视为当时的大事。这也就使我联想到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过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将全体中国人用“红五类”、“黑五类”来区分，自然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乃至生命。两者虽然不好直接比拟，但它却可帮助我们理解在门阀制度下，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就曾举例说：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琅琊王氏，而王敬则是晋陵王氏，姓氏虽同，由于郡望不同，门第相去甚远，当然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因而王俭愤愤不平，以为这

* 仓修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副会长。本文根据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

4 白云论坛 第四卷

样一来，是在降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见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由于郡望之不同，社会地位则全然不同。所以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的社会：“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因如此，所以在当时，这些高门大姓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以防备同姓寒门的假冒。

对于家谱、族谱、宗谱这样一种特有的著作形式或文体，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青年人更加如此。这种家谱、族谱，最初都是由谱（表）与牒两部分所组成，发展到后来则又增加了传、图、艺文、家训等内容。而最基本的则是谱与牒两部分。谱者就是指用列表的方法来记载一家一族的世系发展过程。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因为古代以表来表述家史之书均称之为谱，故将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称之为谱。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学周谱的基础上，编修了《史记》中的十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开头便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谱十二诸侯，就是表列十二诸侯，即作《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主要是取其能够做到简而明，看起来能够一目了然。关于这点，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一文中也已指出：“世系设表，惟取其分别支派，使蝉联系属，皎若列眉，但书名讳，占地无多。”当然，单靠列表有些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他在叙文中又说：“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而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盖古法也。”（《章学诚遗

书》卷十三。)又在《家谱杂议》中说:“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稽查,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家谱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编写的。后来的发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如家族中主要人物或称谱主,为其作传,有的是做过官,有的是学术上有过贡献,也有的是为社会作过贡献,如此等等,都应当在家谱中为其立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提出,家谱中同样应为妇女立传,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就曾这样说:“史传、方志,并有妇女之篇,所以表内行也。……刘向所录,劝戒并存;范史所标,但取高秀。后世乃专划于贞孝节烈,于义虽曰甚正,而途则隘矣。方志宽于史传,家谱自当宽于方志。内行可称,何必尽出一途?凡安常处顺,而不以贞孝节烈当其变者,有如淑媛相夫,贤母训子,哲妇持家,闺秀文墨之才,婢妾一节之善,岂无可录?则规规于节孝斯存,无乃拘乎!”章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而言,因为在理学家看来,妇女一生,只要做到贞孝节烈就行了,也只有做到这些,方能立传,因此,当时就流行着“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章学诚则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只要有过作为、有过贡献、很有才华等,诸如相夫有力(即如今日所称之贤内助)、教子有方等都应为之在家谱中立传。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的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若是能按章氏这个主张编写家谱,那么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不仅会知道自己的曾祖、高祖、祖父等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将可以了解到曾祖母、高祖母等为这个家族所作过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宏扬。除了传记以外,许多家谱都还绘有各种图。谱主或家族中主要成员都还绘有画像、祠堂、莹地也都绘有平面图,注明所在位置和朝向。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

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谱为家史，前人嘉言懿行，诸传既已载之，文则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于首矣，旧谱传状，多删取为新谱列传，取划一于体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录于文征，非第存文，且使新谱诸传，详略互见，亦史家旁证之遗愿也；考订论辨之文，有关先世传闻异同，嫌介疑似，尤为谱牒指南，则次列之；诗赋词章，或有所抒发，或中有感遇，古人所贵赋诗以见志也，则又次列之。”以上三方面内容，应为“文征内篇”，所选皆为本族人所写。而对于亲友应酬投赠，亦应选录编为“文征外篇”，以显示本族“当日交谊”之盛。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家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承传、发展的历史。对此，历史学家实际上早已下了结论，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州县清立志科议》中就曾这样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文史通义新编新论》外篇四。）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邵晋涵也说：“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州之有志而并重也。”（《南江文钞》卷九《余姚史氏宗谱序》。）

二、私家之谱起源于何时

作为一个家族的私家之谱究竟产生于何时？就已知研究谱学的文章来看，显然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在两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有的则说在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两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现在有的研究者把西周青铜器上所刻的世系表一律称之为私家之谱，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在西周时期，产生后来那种私家之谱的社会条件并不存，而当时能够铸造规模如此宏大的青铜器，显然都是贵族阶层。赵光贤先生在《周化社会辨析》一书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宗法制度是周人在新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为他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以维持大小

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目的的，间接以巩固封建秩序为目的的，所以说宗法制度是支持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战国以前，宗法制度本来是贵族阶级所专有，与庶民无关。”在周代社会中，要么就是宗法制度下的大小贵族，要么就是与宗法制度无关的庶民，这种庶民能有能力铸造为自己祖先歌功颂德的青铜器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所有青铜器大多出自各类诸侯所制造，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否则能够兴师动众的铸造吗？因此，这种家族与秦汉以后的“私家”自然不能等同，当然将青铜器上的世系表视作我们今天所讲的私家之谱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谱牒学是起源于西周，而私家之谱的产生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我在《试论谱学的起源》（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一文中已经有过论述了。而私家之谱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促使着这种私家之谱的大量发展，第一，门阀制度是使私家之谱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条件。两汉以来，由于地方豪族地主经济的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乃形成了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这些世家大族，大都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家，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群体。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只要得到推荐，就很快能够登仕。加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又是为巩固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制度。因为当时的所有政权，都与这些世家大族是休戚相关的。世家大族正是这些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当然每个政权对这些世家大族也就无微不至的关怀。就以东晋政权的建立而言，就是得到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重建，其中琅琊王氏拥戴之功居多。因此，王导位至宰相，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司马氏所重建的东晋政权是与世家大族共有的天下。根据史料记载，王、谢两家在江浙一带占有了大量的良田。这些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特权，维护门第制度，于是又各自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

8 白云论坛 第四卷

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于是便大写家谱、族谱，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郡望的优越。于是就出现了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郝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玕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著名的郡望大姓，对这种现象，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这些世家大族，便纷纷编修族谱、宗谱，以防止寒门同姓的假冒，垄断自己固有的特权。

第二，当时社会上的避讳流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须懂得谱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之风盛行，因此，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交活动中，都得熟悉谱学，否则不仅要得罪人，而且还会引发是非，乃至招来大祸。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颜之推亦深感无可奈何：“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之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谬赖焉。”（《颜氏家训·风操篇》。）一位学者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北齐高祖高欢，其父名树生，据《北齐书·杜弼传》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谄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杜弼为之辩护几句，高祖又骂杜弼，并“叱令出去”。可见凡是不小心而触犯帝王之避讳，就要遭到如此厄运。因此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名字触犯了帝王之讳，宁可弃官不干，免得引来大祸。此时不仅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就连后妃亦是如此。著名的如郑太妃小名叫阿春，东晋建文帝母亲，晋元帝妃，后追尊为太后。因此春字就得避讳，故当时地名中凡遇春字悉改为阳字，富春改为富阳，宜春该为宜阳，而历史书凡称春秋者，皆改曰阳秋，于是就出现了《晋阳秋》、《汉晋阳秋》等书名。而在日常社交中，凡涉及对方父祖之名时必须回避，否则将会引起对方的痛哭流涕。据《北史·熊安生传》记载，北朝儒生熊安生，会见徐之才、和士开等人，“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这自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这就说明，由于避

讳之风盛行，家谱就显得更为重要，不了解社会上那些重要的谱系，真是寸步难行。据《南史·王僧孺传》记载，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传为佳话，也说明作为一名谱学家确实也不容易。

至于什么叫“避讳”？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看来也不单是年轻人如此。实际上如果能够知道一些“避讳”的常识，对于阅读古代书记还是大有好处的。著名学者陈垣老先生在其所著《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是这样说的：“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又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避讳篇》中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可见避讳这一不良的风俗，在我国两千年历史发展中，在史书撰写和文献记录中，都曾起过深远的影响。上引两段陈老的论述，既为我们讲述了什么叫避讳及其起源发展情况，又为我们讲清了避讳在古代书籍中特别是史书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今天掌握和利用它的意义何在。正如陈老所言，“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避讳并不是专指对君主而言，对于“所尊之名”同样是要闭会的，如对于自己的师长和长辈，在旧社会里都是要避讳的，对于他（她）们都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我们上面讲的北朝儒生熊安生去拜会两位朋友时避讳的情况就是明证，这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周书·熊安生传》是有明确记载的。又如我小时候曾读过私塾，私塾先生就曾这样教我们：“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但这个“丘”字就必须读作“某”，而在书写的时候还必须缺一笔“丘”，表示对孔老夫子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读这

么做并不知道，恐怕私塾先生本人也未必知道，原来这就叫做避讳。而对于当代的帝王自然更是非避讳不可了，否则还将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不仅是人名、地名必须避讳，即使是姓氏、官名也得要改。就以封建时代中央所实行的三省六部而言，唐初的六部是：史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唐高宗即位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遂将民部改为户部。又如对都城的称呼，本称京师，到了西晋，司马师称帝后，避其讳，遂改称京都。总之，古代书籍中，由于避讳而改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书名、谥号等真是比比皆是，这就给后人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就以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而言，在他的著作中，许多用于避讳懂得字若不加改正，就很难读懂其原意。如他为了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的讳，凡是治历明时，他都改作治宪，不知其讳者，自然就读不通了。相反，如果我们了解并掌握了避讳的常识，则在阅读和研究古书时就可以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事实上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已经利用避讳识辨了许多疑难历史问题和伪书。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就是用避讳来考辨一些书籍的真伪。清代史家钱大昕也是利用避讳在史事的正误和辨伪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阅读范曄《后汉书》时，利用避讳知识就发现了后人将注文抄入正文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后汉书》作者范曄，其父名泰（太），因此，范曄在撰写《后汉书》时，尽量避开泰字，于是对于东汉名士郭泰，他在书中则一律称用其字林宗。（非但本传如此，在其他传中凡涉及者亦称郭林宗。）可是在有些《后汉书》的传本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二，《后汉书》三，《郭太传》条，全文照录这段文字后，发表了如下看法：

予初读此传，至此数行，疑其词句不伦：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它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书字不书名，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叔度不书姓名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僦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

钱大昕在其议论中，首先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指出此段文字非常明显地有违于范曄著书的书法，再加上其它三点理由，从而肯定了这段文字并非《后汉书》原文，乃是后人抄书时，将其搀入正文之中。可见懂得一些避讳知识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避讳这一特殊风俗，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书乃至所有文献的记载。因此，它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史料的正误上，都起着其它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不可轻视它。

第三、婚姻门当户对以家谱为据。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必须门当户对方能通婚，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可逾越之鸿沟，如有违者，必将遭到制裁。所以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就曾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要证明确实是门当户对，宗族之谱在此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宗谱、家谱都必须注明郡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门第之高下。许多出身寒门的大官僚，在得到高官以后，总是千方百计想通过联姻手段，高攀衣冠世族，以改变自己社会低下的地位。拥有大权的侯景向梁武帝请婚于王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高门，可于朱张以下求之。”（《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而宠贵一时的赵邕想与范阳卢氏联婚，卢氏不从，逼出人命，“邕坐处死，会赦得免”，还是落得个“除名”的下场。（《魏书·赵邕传》。）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下嫁于富阳满氏，氏族出身的历史学家沈约，认为门第不当，专门写了奏疏弹劾王源，并要求把